

渔父题材类作品的断代和辨析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唐代佛教文学中涉及渔父题材的作品已经不少,但是有一些可能经过了宋人的加工。人们一般公认最早将渔父精神与禅宗沟通的人当属唐代禅师船子德诚(约九世纪上半叶在世),德诚隐居于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吴江畔,以小舟渡人,因号船子和尚,传法给夹山善会后,当即入水而逝。孙昌武指出:五代时期编撰的《祖堂集》里辑录了他的几首诗颂,完全是中唐流行的禅偈风格,其中诗情较浓的一首如:“一泛轻舟数十年,随风逐浪任因缘。只道子期能辩律,谁知座主将参禅。”宋初的《景德传灯录》里对他的记述也很简单,并没有录诗颂,只是说他在吴江上泛舟,谈禅时有“垂丝千尺,意在深潭”之类富于诗意的话。到了南宋末年编撰的《五灯会元》,所录船子德诚的诗颂面貌全然不同了,其中著名的一首:“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这后出的诗颂体现了南宗禅任运随缘的精神,把船子和尚描写成率性疏野、随缘度日的理想的南宗禅师,而从诗的写法看则完全是宋人的风格。后人还编有《船子和尚拨棹歌》二卷,收录德诚渔父歌词39首,吟咏渔人生活,寓以佛法禅理,并附有历代僧俗和咏若干首。可以断言,船子和尚这位唐代禅师是经过宋人“包装”、“重塑”过的,其用意很可能是为了应和宋人的渔父情结。这里就引出佛教文学史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研究难题,那就是佛教文学史料的断代和辨析。正如孙昌武指出的,宗教圣典不同于个人创作,著作权并不那么重要,从而造成了作品文本的流动性(这和一般所谓篡改不是同一的概念)。今人利用禅籍进行辑佚,稍有不慎,就会产生问题(这一点也说明,对宗教文学的特殊性必须有足够认识,否则研究难以开展)。因此,认识作品的流动性——实际上即是宗教文学的特殊性,对于一些具体作品的年代作出充分的考订,是佛教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而难度很大的问题。就佛教文学而言,宋代就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年代,因为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佛教文学材料,很多是来自宋人的,它们是否经过了宋人的加工改造?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这部多卷本《中国宗教文学史》如果能够在在这方面多做一些工作,就是对宗教文学研究的一个有利推进。

辽金元佛教文学史研究刍论

李舜臣^①

何谓“佛教文学”?关于这一问题,中外学界历来聚讼纷纭,至今尚无定论。这里,我们将其狭义地指称为僧侣创作的文学作品,而不包括文人创作的具有佛教色彩的作品。依照常理,“佛教文学”研究范围的认定,应与中国文学中“山水文学”、“边塞文学”、“贬谪文学”等众多术语一样,需考量的是它所表现的内容,而非作家的身份。然而,倘若如此,中国佛教文学史则几与两晋至清末的文学史重合,因为在这—时段里,几乎很难找到不写带有佛教色彩作品的著名作家。因此,为更好地梳理文学史实,呈现出一部较为完整而纯粹的中国佛教文学史,我们只能作如是处理。严格说来,我们所讨论的“中国佛教文学史”,更确切的说应是“中国僧侣文学史”。至于何以不径称为“中国僧侣文学史”,《中国宗教文学史》总编吴光正将会有更为翔实的说明。此处仅就辽金元佛教文学史的研究,略陈陋见。

辽金元佛教文学史的研究,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从佛教史层面而言,这一时期是中国佛教由盛而衰的转变期,禅教合流、丛林世俗化进程愈趋明显;同时,这一时期也是华夏大地继南北朝之后,各民族文化融合、碰撞、演进最为剧烈的时期,不同的宗教形态、教派此消彼长,互相容纳,从而对明清佛教乃至近代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而,认真研究此三代的佛教文学,了解僧侣的生活形态、心态、情感,可以使更加准确地把握这一时段佛教发展的态势和特点。再从文学史层面而言,从东晋以来,佛教文学一直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僧侣是推动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力量,诸多的文学观念、文体形态、创作

^①李舜臣,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江西 南昌 330022。

倾向的形成,都与他们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关注的更多是唐宋佛教文学,而于此三代则缺乏总体的认识,个案研究亦凤毛麟角。辽金元僧侣作家的总体成就固然不及唐宋,但其中亦不乏杰出者,他们的文学声誉在当时或后世均很显著。例如,金末诗僧性英,被元好问称为“诗僧第一代,无愧百年间”。元代释圆至的文章,方回亦称:“非特南渡后僧无之,南渡后士大夫亦未可比也。”栟堂益的《山居诗》四十咏,被云栖株宏称为“气格雄浑,句字精工……为诸家绝唱”,明代次韵其诗者,竟成为丛林一时风气。可见,深入研究这些僧侣的文学,也可以进一步丰富我们对这三代文学史的认识。

佛教文学与特定时期的佛教发展相表里,同样也会呈现较为鲜明的时代特色。辽金元都是由少数民族建立起的王朝,文化水平相对落后,对佛教的认识和信仰的选择,与汉民族王朝都有所不同。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原来盛行于边鄙的宗教信仰、习俗,因受到统治者的宠信和扶植,其影响辐射到汉人聚集区。例如藏传佛教,本是融合了印度佛教、汉传佛教以及本土原有宗教苯教而形成的一种具有高原民族特色的宗教,其影响一般仅局限在西北地区,与内地交流并不密切。但是13世纪中叶,西藏纳入元蒙中央版图,因藏僧在统一吐蕃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及藏传佛教的理论和仪式颇契合元蒙原有的风俗,故受到了统治者极高的宠信。中统元年(1260),更建立了所谓的帝师制度。《元史·释老》称:“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道家方士之流假祷祠之说,乘时以起,曾不及其什一焉。”藏传佛教大小乘兼学、显密双修的教义,复杂的仪轨像设以及“政教合一”的发展模式,都给汉地佛教文化增添了新的色彩。

受此影响,辽金元佛教文学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其显著的特点就是少数民族僧侣加入到汉语佛教文学的创作当中,甚至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而在此之前,佛教文学创作主要是汉族僧人,很少能看到少数民族的身影。例如,辽代契丹僧人寺公大师,耶律楚材称“其旨趣高远,不类世间语,可与苏、黄并驱争先耳。有《醉义歌》,乃寺公之绝唱也。”《醉义歌》长达126句,虽演绎了佛理和庄子齐物论思想,但情感和形象均很饱满,文采斐然。再如,元代藏僧蔡巴·贡嘎多吉撰写的《红史》,记载了藏传佛教的发展史,其间的传说、神话,充满想象的色彩,在汉藏两地均有极大的影响。又如元末回鹘人鲁山,不仅有诗集梓世,而且还与贯云石、黄潜、吴师道、柳贯等人唱和,《诗渊》至今仍存有其诗十余首。这些少数民族僧侣的加入,不仅是僧侣作家队伍的简单扩容,更使佛教文学增添了一些新的特质。例如,藏传佛教文学的“道歌体”、“格律体”和“年阿体”等诗体,各具特点,均为汉语佛教文学所未有,大多形成或发展于13至15世纪。以“年阿体”为例。13世纪后半叶,藏僧雄顿·多吉坚参将印度诗人檀丁的《诗镜》全部译成藏文,学习、研究一时蔚然成风,他们用《诗镜》的理论和修辞手法创作,形成了影响巨大的“年阿体”流派。“年阿体”的特点,是用韵文撰写文学作品和佛学论著,讲究修辞和辞藻,韵律、节奏鲜明,意在将深奥的哲理、玄妙的教义,晓畅化和诗意化。^①这类诗体,不同于偈颂,与禅宗的拈古、评唱也不一样,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尽管密宗、藏传佛教深为统治者所崇信,但在汉族地区盛行的依然是传统的佛教教派,辽金元佛教文学创作的主体也仍是汉族僧侣。我们曾根据《元诗选》《元诗选癸集》等文献,对元代诗僧的地域分布和宗派构成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数据统计,发现在可确定占籍的92人中,浙江、江苏、江西、福建和上海五地有88人,占95%。而在其宗派归属可考的68人中,禅宗59人,占88.9%;天台宗8人,占12.5%;律宗1人,占1.7%。其中归属禅宗的临济宗有38人,占59.5%。可见,元代诗僧主要出自于江南地区的临济宗。临济宗禅僧多善外学,这既是传统的延续,也与南方佛教的发展密切相关。藏传佛教在南方虽然有杨链真迦等人的大力推行,但由于他们怙势恣睢,欺凌百姓,致使江南佛教风气寝弊,引起很多高僧的极大反感,真正潜心修习喇嘛教的汉地僧人并不多。南方汉族僧人主要属于虎丘绍隆和大慧宗杲两系。绍隆系下又衍生出松源崇岳的“松源系”和破庵祖先的“祖先系”;大慧宗杲座下则以妙峰之善的“之善系”和北涧居简“居涧系”为盛。从元代诗僧基本分属于这四大法系的情形可以看出,僧侣作家创作能力的高低与其所属宗派的兴衰,存在极为密切的关联。

辽金元佛教文学的研究,起步较晚,上个世纪仅有陈德芝等人的一些单篇文章,以及学者们在编纂断代文学总集(如《全辽文》、《全金诗》、《全元文》)时,才略有所及,系统化的研究很少看到。近些年来,

^①克珠群佩:《西藏佛教文学与佛教对藏族文学的影响》,载《西藏文学》2004年第4期。

随着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已有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此一领域。例如杨镰《元诗史》论列了14位释氏诗人,对他们的生平、著述及版本进行了较为清晰的概述,并精辟地分析他们的创作个性。杨镰还担任了《中国历代僧诗全集·元代卷》的主编,据称此项课题已基本完成,相信出版之后,必将沾溉学林。在前辈学者的影响下,近年出现了一些专门的博士、硕士论文,例如高磊《辽代佛教文学形态探究》、李舜臣《元代诗僧研究丛稿》、蔡晶晶《元末明初诗僧群研究——以来复、宗泐、姚广孝为中心》、韦德强《元代中后期诗僧研究》等,均各有特色,显示出这一领域的研究已逐渐走向深入。

不难看出,目前关于辽金元佛教文学的研究还存在两个明显的缺憾。(1)研究者主要侧重于诗歌方面,佛教的塔铭、忏悔、颂赞、偈颂、拈古、颂古、评唱等文体几乎未能涉及。过去,我们多不将这类文体视为文学看待,但其实它们并不缺乏想象、虚构、韵味等文学因子。辽金元三代,这方面的文献还颇为丰富。即佛传文学而言,就有释昙噩《新修科分六学僧传》30卷、释熙仲《历朝释氏资鉴》12卷、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22卷、释觉岸《释氏稽古略》4卷等;宗门评唱有万松行秀《从容庵录》6卷、《请益录》2卷和林泉从伦《空谷集》、《虚堂集》等。(2)研究者关注的主要是汉语佛教文学,很少顾及藏语、蒙语佛教文学。实际上,非汉语系的佛教文献是极为丰富的。明代用藏语所刻的《大藏经》中,里面收入了大量寓言、故事、叙事诗、格言诗、戏剧等佛教文学作品。由于语言的障碍,一般研究者几乎从未涉猎过这些文献,只是本民族的学者才真正下过工夫。关于这个问题,《中国宗教文学史》将专列《藏传佛教文学史》、《蒙古佛教文学史》,并请专门家进行细致的研究。辽金元佛教文学史,将止涉及一些已翻译成汉文的藏语、蒙语佛教文学,以得管中窥豹之效。

佛教文学史与一般文学史相比,应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首先,任何文学史都应清理文学文献、史实,描述文学发展的风貌,探索文学发展规律为旨归。佛教文学史的撰写当然也应承担这样的使命和任务。因此,辽金元佛教文学史首要的任务,是为这一时段的佛教文学文献提供一份详细的清单。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此三代的文献典籍保存极为不善,尤其辽、金传世文献更加了了。我们至今尚未发现辽、金僧侣的遗存别集,《全辽文》、《全金诗》等总集已收入了不少作品,但仍有遗佚。元代现存11家14种僧人别集,另有《元诗选》、《全元文》等总集,但散佚也相当严重。据考察,至少还有50余种元代僧人别集已散佚不存。我们将从《永乐大典》、《澹游集》、《元诗选》、《大藏经》、《续藏经》等丛书、总集和山志、地方志中,以及《辽金元石刻文献全编》、《金碑汇释》等出土文献中,钩稽出他们的优秀作品。同时,对所论列的僧侣重要作品,都尽量说明其存留状况和版本出处。在扎实的文献基础上,我们将采取史、论、考结合的方法,不满足于简单分析作家生平、作品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叙述模式,而是以考证为基础,以史带论、以史立论,力图呈现出一些特征性的命题。例如,辽、金、元僧侣作家的时空分布、宗派构成、世系承传如何?金元佛教作家的文体选择及其宗教内蕴?等等。

佛教文学,传达的不仅是僧侣个人的心性、情感,还承载着阐释、传播佛教教义的功能,实际是宗教与文学的重合体。陈垣认为,佛教之所以能“深入社会中心”,有三种原因,第一就是“能利用文学”。因此,佛教文学史的研究还有其特殊的命题,即除关注文学性之外,僧徒的宗教活动也必须予以充分的重视。从本质上说,僧侣全部的生命意义在于他的宗教活动和宗教信仰,而文学创作正如教内所认为的那样属于“外学”。因此,宗教活动不仅不能只视为佛教文学创作的背景而作简单的勾勒,甚至应上升到核心层面进行细致的研究,研究者应树立起将僧侣的文学创作视为其宗教活动一部分的整体意识。只有这样,方可能准确把握僧侣的文字般若,彰显出佛教文学的意义。例如佛门中常见的水陆法会,所供养的圣凡,以及繁琐的内容、程序、道具,不止是纯粹的宗教仪轨、设像,同样也糅合了艺术的成分,故为后来的戏曲演剧所吸收。而其仪文,像元叟行端的《朝廷金山作水陆升座》和月江正印的《金山大会归上堂》,也是条理有章,辞理双得,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目前已有不少文学研究者关注到宗教仪式活动,但大多是在溯源某种文学现象或文体形态(比如戏曲的演剧形态和仪式功能)时,方联系到宗教仪式活动;而对于其本身的意味,则缺乏更为细致的挖掘和阐释。

其次,佛教文学与世俗文学相比,除表现内容、情感特征等方面存在差异之外,其文体、语体等形式也具有自身的特色。僧侣们独创的偈颂、语录、举古、拈古、评唱、代语、别语等,实际是佛教文学典型的

文体,也最便于他们表达佛教思想和自家风气。这里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僧侣选择这类文体表达自己的心性和教义,是否有着独特的思考和策略?是否真如圆悟克勤所说的是“绕路说禅”、“据款结案”呢?还有就是佛禅的语言,往往是横说竖说,正说反说,显说密说,显示出诡谲的特色,这样的语言策略既不同于庄子的寓言,更不同于儒者之语,而形成这种特色的原因又何在呢?这些都是佛教文学研究中应当关注的问题。辽金元的僧侣作家,虽在文体、语体方面无太多创新,但在解读和分析他们的作品时同样应具备这样的理念和意识。

基督教汉文文学的发展轨迹

宋莉华^①

基督教汉文文学是明末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的特定历史语境中产生的特殊文学作品,它们最初是传教士努力消解中西文化差异与隔阂来传播基督教文化的重要媒介,是西方来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体验的独特表达,后来逐渐融入并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明清之际百余年间,耶稣会士或译或著的中文书籍,据费赖之(Louis Aloys Pfister)所录约450种,马祖毅《中国翻译史》列出了238种,裴源《明末清初东来耶稣会士翻译著述之研究》列出191种,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则收录了756种中文译著。有关1807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以来新教传教士的中文著作,也有一些重要书目,包括:1867年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编*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ous Indexes*,该书目在每一部著作后都附有简单的提要;1867年出版的*A Classified Index to the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Protestant Christian Churches in China*,此目后来不断有续编,有上海广协书局1933年、1936年、1938年等版本可供查考。此外,还包括两部在世界博览会上展出的书目*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Collect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Philadelphia, 1876*; *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Collection of Exhibi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Exhibition, London, 1884*。墨笃克(John Murdoch)编纂的*Report on Christian Literature in China, with a Catalogue of Publications* (Shanghai: Hoi-lee Press, 1882)也很重要。1901年,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ray)编纂了*New Classified and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Current Christian Literature*。该书目又于1907年以同一标题出版了更为详尽的版本。雷振华(George A. Clayton)编纂中文书目《基督圣教出版各书书目汇纂》。此外,还有《协和书局图书目录》(*Catalogue of Chinese Books Sold by the Mission Book Company*)以及广学会历年出版的多种《广学会图书目录》。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基督教汉文文献已陆续整理出版:方豪影印了《天学初函》,吴相湘主编出版了《天主教东传文献》、《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天主教东传文献三编》。1996年,比利时鲁汶大学的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 S. J.),杜鼎克(Adrian Dudink)教授和台湾清华大学的黄一农教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祝平一研究员等人编辑了一套《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由辅仁大学神学院影印出版。2002年钟鸣旦等人又编辑了《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由台北利氏学社出版。2003年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修订重印了由郑安德编辑的五卷本《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其中收录的文献主要缘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和梵蒂冈图书馆。此外,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编纂委员会编纂,王秀美、任延黎主编的《东传福音》(二十五册)2005年由合肥黄山书社影印出版,收入自唐至民国的文献共380余种,内容涉及景教、天主教、基督新教和东正教。

^①宋莉华,上海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34。